

近代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

金普森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近代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

金普森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金普森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308-09117-6

I. ①近… II. ①金… III. ①外债—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F81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0839 号

近代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

金普森 著

责任编辑 谢 焕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46 千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117-6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作者简介

金普森,名允通、字普森、号重阳。1932年重阳节出生于浙江义乌。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78—1993年任杭州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主任,杭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1994—1998年任杭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院长。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国经济史、浙江地方史。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稿》、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主要著作、合著、主编的有《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现代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胡愈之传》(杭州大学出版1991年版)、《虞洽卿研究》(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1996年版)、《浙江通史》第1—1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

主要学术兼职,现为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委员等。



作者与夫人在寓所园内



作者夫妇与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许毅教授讨论问题



《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第四卷(内容为新中国外债)编撰研讨会与会人员合影

从左至右：申学锋博士、潘国旗博士、孙永松教授、叶振鹏教授、许毅教授、陈宝森教授、金普森教授、王国华博士、黄明道高级经济师、张侃博士

目 录

究源发新 服务现实	/ 1
清代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	/ 14
北洋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	/ 25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	/ 37
甲午战争前的中国外债	/ 53
论左宗棠西征借款	/ 75
中日甲午战争与中国外债	/ 91
北洋时期的财政与外债	/ 100
外债与抗日战争的胜利	/ 108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之内外债	/ 118
近代中国内外债的相互演变	/ 133
近代中国外债中的恶债问题	/ 159
附录一：新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	/ 172
附录二：新中国外债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 184
附录三：1930年前后的中国经济	/ 194
后 记	/ 243

究源发新 服务现实

——《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开头语

时光是不能往后看的,仿佛并非很久,其实已经很久。近代中国外债资料的整理与近代中国外债史的研究,在扬州开会商讨近代外债史的研究,似是昨日之事,但已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光。学术研究是花费时间与精力的事,发掘与搜集资料是无穷尽的,学术研究更是无止境的。只有在占有厚实史料的前提下进行潜心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文稿才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不断学习研究,不断思索推敲,修正自己撰写的文稿,才能与时俱进,使学术生命长青。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在许毅教授带领和指导下,我们对中国外债史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搜集、整理,先后完成了《清代外债史资料》、《民国外债档案史料》、《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等资料整理工作。为了统一思路,许毅教授于1988年发表了《论“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一文,提出了外债的两重性问题,强调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论述外债在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形成方面的意义。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和长时期的思考,他开始酝酿以外债为切入点,通过对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举借外债、利用外资情况的考察,来剖析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方方面面,达到寻求规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为我们当前乃至今后的各项建设工作提供借鉴的目的。这就是许毅教授主编的四卷本丛书《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的由来。究源发新、服务现实是研究中国外债问题的宗旨,也是这套丛书的出发点与立足点。丛书出

版后,许毅教授要求作者对四本书进行认真研读,详尽考订,仔细修正,将修订后的书稿再次出版。在丛书修订版付梓之际,我把读许毅教授著《中国特色论》感受而写下的一文,稍作修改,权充这套丛书修订版的开头语。

究源发新,治史者的追求

对历史的不断探究是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不断地发新则是治史者的责任。历史研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付出艰辛的创造性劳动,才能究源发新,使我们的认识走近历史。

在对近代中国外债的研究中,许毅教授揭示了“富有四海”的清王朝为什么会走上举借外债、甚至依赖外债以度日的根源。从1662年到1795年是史称的“康乾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盛世以后,为什么清王朝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呢?这种巨大的反差要求我们必须研究从“康乾盛世”到“嘉道中落”直至“宣统覆亡”的历史原因。早在1988年,许毅教授在《论“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一文中就提出了上述问题。经过几年的研究,他于1996年与王国华一起撰写了《由康乾盛世到嘉道中落的教训》一文。文章考察了盛世的起源与盛世气象,探究了盛世危局和衰落根源——奢侈与腐败,剖析了嘉道中落的催化剂——使中国元气大伤的鸦片贸易,阐述了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是鸦片战争的致命打击。从而得出结论:“鼎盛之际,统治阶级居功自傲,放弃了文治武功、励精图治的积极进取精神。乾隆羡慕江南湖光山色,六次南巡,沿途的接驾盛况,奢靡之极,上行下效,腐败之风刮得剽悍无敌,英勇善战的八旗子弟和绿营,变成战则必败、祸害百姓的罪魁,清正廉洁的满汉官员,变成官无不贪、吏无不恶的祸首,文治武功全废。在英国殖民主义于1840年发动的鸦片战争中,虽然在汉人将领抗拒之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焚毁了没收的鸦片,清政府却摘了林则徐的帅印,以致转胜为败,签订了丧权辱

国的《南京条约》，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开了先河。”^①通过对“康乾盛世”的形成和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考察，我们对“历史周期率”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这里，给我们说明了一个真理：经济的发展，文明的昌盛，如果是自发的发展而不觉，如果不为人民而只图一时之享受，如果不提倡为公而只倡导为私，其能留给自己的只能是苦涩。人们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往往因无知、侥幸、自私而贻误大业，为自己留下的只是毁灭的祸根。对此，《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第一卷得出结论：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事实证明，腐败是万恶之源。清朝的衰败灭亡与腐败有关，外债也与腐败有关。腐败断送了清王朝，腐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陷入被瓜分的深渊。腐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在兴盛和富裕后不思进取，贪图享乐，骄奢懈怠，必然会腐化衰败，挨打受气，任人宰割，最后灭亡。盛而骄，骄而奢，奢而贪，贪而腐，腐而朽，朽而亡，这就是清王朝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这个教训是值得认真吸取的。

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是20世纪中国先进分子思考与求索的问题，也是《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论述的一个重大问题。许毅教授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遵循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②这一原理，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是借助于洋务运动、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建立的近代化大生产的生产力，从而提出了中国近代化大生产的生产力是怎样发展起来的问题。究源才能发新，才能深层次地回答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重大而根本的问题。

许毅教授在《论“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和《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的特殊性》两文中，详细阐述了我国现代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他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创造过程，不是从自身的生产方

① 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106页。

式中一步一步游离出来的,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之后,为了反压迫、反侵略,为了自强,不得不引进外国资金与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用举借外债的特殊方式,发展近代工矿企业、铁路、邮电、航运、通讯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所有这些方式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①凭借国家信用向外国举债,直接买进先进技术,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特殊形式。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种形式,是国家政权利用国家财政,直接动用国库或国家信用(包括内债),来创办工业。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三种形式是大官僚(包括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以及后来的宋子文、孔祥熙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或侵占公款,创办近代工矿企业、金融事业。举借外债则是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方面。许毅教授还特别提到决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的演变过程。他认为:“我国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与‘两声炮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②以往的历史学界、经济学界对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中,多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对中国的影响来分析,忽视了对“十月革命”炮声之所以在中国产生影响的物质基础的考察。没有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阶级基础,中国不可能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了解“十月革命”期间中国的物质基础,必须究源于鸦片战争的炮声给近代中国的影响。正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打开了清政府的国门,“清政府为抵御外国侵略,发展军用、民需工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事业,便举借外债,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展了社会化的生产力”^③。

近 20 多年中,许毅教授带领我们就外债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分析,粗略统计在新中国诞生前的 96 年(从 1853 年上海商借款算起)中举借的外债共计 900 多项,目前查明的约有 730 多项。清政府时期举借的 155 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债款总额的 29.2%;南京临时政府举借的 23 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债款总额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19 页。

② 许毅:《中国特色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0 页。

③ 许毅:《中国特色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1 页

25.84% ;北洋政府时期举借的 387 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债款总额的 40% ;护法军政府举借的 57 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债款总额的 47.8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举借的 36 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债款总额的 31.11% 。

从以上几个历史时期来看,中国近代外债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也是它们在华争夺政治、经济权益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外债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外债为道德上的恶所形成,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①,“中国近代化的生产力、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可以说主要是依靠外债。”^②

服务现实,学术研究的宗旨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出于时代的需要,人们总会不断地从历史中寻求启示,并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然而,历史不应是任人摆弄的玩偶和映射工具,它应有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治史者立足现实,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把促进社会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的字里行间,处处闪耀着一位老革命、老学者“研究历史、服务现实”的良知与责任。

在中国财政史的研究中,许毅教授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不应就财政论财政,就外债论外债。他曾在《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和研究财经史的方法》一文中写道:“财政史是财政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本身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然而,在财政史的教学与研究中,就财政论财政的倾向相当严重,致使一部财政史变成了一部就财政制度论财政制度、就财政思想论财政思想,脱离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演变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制度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33 页。

② 许毅:《中国特色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4 页。

列、思想罗列。它既不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又找不到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造成目前财政史的教学与研究缺乏生气的直接原因。”^①如何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既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统一的“普遍规律”运用到财政学特别是财政史的研究中去?他说:“这是当代财政理论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为从事财政理论与财经工作的一员老兵,我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思考。我认为,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一‘普遍的规律’,无论是改革还是总结历史规律,都必须以邓小平同志教导的革命和改革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出发点和归宿。”^②他充分地理解恩格斯在撰文介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关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并运用这一方法,从生产力再生产规律,生产关系再生产及生产方式再生产规律,社会关系再生产规律三个层面,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进行了剖析。通过这种剖析,使财政史的研究范围得到拓展,打破了沉闷的窒息空气。通过同生动的市场经济联系起来,使财政史研究成为研究经济运动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并指导实践的一门学科,从而达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挥应有的史学“资治”功能。

在外债史研究中,许毅教授对外债的两重性分析,也是着眼于国家的独立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外债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外债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从经济上控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一部近代中国外债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华史。但是,外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更多的资本、更多的技术、更高的生产力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发展的要素。许毅教授反复强调要认真研究外债的两重性,“在利用外债过程中扬长避短”;对外债“利用得好,会给一国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进和加速作用,利用得不好则会给社会和人民造成沉重负担,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引进外债的过程中必须加以科学论证,谨慎对待”^③。他提出,要吸取 20 世

① 许毅:《中国特色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0—91 页。

② 许毅:《中国特色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1—92 页。

③ 许毅:《中国特色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3 页。

纪80年代世界性债务危机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他还时刻关注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他所做的研究,都是为吸取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为如何建设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现实问题在某些方面作出自己的解答。

在许毅教授的主持下,从1983年开始,我们对中国近代外债资料进行整理,编辑出版了《清代外债史资料》、《民国外债档案史料》和《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等,字数在千万字以上。随后,对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的外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撰写了这套四卷本的《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当第四卷书稿完成后,许毅教授提出要写一篇总结性、概括四卷内容的结束语。经过多次讨论,命题为《科学的实践 历史的启迪——〈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结束语》,强调本丛书写作的目的绝不在于简单地记录历史的变迁,而是通过回顾清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这四个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成败得失,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为我们当前乃至今后的各项建设工作提供参考,以便早日完成中共中央制定的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外债虽是这套丛书的主线,但也仅仅是切入点。认识今天,展望未来,首先要以认识昨天为基础;认识昨天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今天、展望未来。正如列宁谈到历史研究时所说的:“为了用科学的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①在丛书的结尾部分,我们从中国近现代的史实出发,并从客观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实践中理出了十六个问题,阐述了基本理论,总结了经验。这十六个问题对我国当前的建设以及未来长远的发展,会起到积极的宏观导向作用。

许毅教授从干部到学者,研究历史源于对现实的困惑,走了从现实追溯历史,又从历史回到现实的治学道路。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给了他不一样的眼光和见识,他也给了我们挣脱学术之茧的利刃。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与时俱进,学术生命长青

《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着眼于对历史的考察,但其根本目的不是单纯地描述历史进程,而是通过对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让大家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及其社会性质。为了从更高的理论层次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许毅教授于2004年出版了专著——《中国特色论》。这部著作与《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可谓相辅相成:一个侧重理论的把握和现实问题的解决,一个注重历史资料的搜集与历史借鉴。所以我在这里有必要谈谈《中国特色论》一书。

《中国特色论》不仅反映了许毅教授历史的大眼光,也反映了他与时俱进的人生追求。他在前言中写道:“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能变,但是它的具体应用要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两者的相互适合也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一定条件下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慢慢又会不适应于生产力的新发展,两者总是在动态的发展中获得平衡。在学术研究领域,这种动态的发展过程同样是客观存在的。人的认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而逐渐向前发展的,具体到这本书中收入的文章而言,它们既是紧紧围绕着中国特色论这个中心议题而展开,同时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在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深入实际、与时俱进的客观反映。”^①

与时俱进使许毅教授的学术之树长青。1976年,他牵头组织北京及浙、闽、赣的专家学者,深入到中央苏区,发掘整理中国共产党在闽、浙、赣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时期的财政经济史料,编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而后又组织了全国从事中共党史、财经史的部分学者,对陕甘宁边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川陕、湘鄂西、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东、东

① 许毅:《中国特色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北、中原以及东江、琼崖等中国革命不同历史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在各地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选编了31种、约4000多万字的财政经济史料。对其中一些较大的根据地,还编写出版了根据地财经史,共18种,约560万字。这些成果一方面回答了如何依靠落后的农村经济来支持革命的需要,进而由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另一方面也解答了如何解决落后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原理。

大家都知道许毅教授是我国财政理论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的倡导者之一。他扬弃了西方资本主义“公共消费”、“公共财政”等理论的影响,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逐步形成了有关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国家分配论”搞清楚了财政分配的对象是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分配关系与分配形式和分配活动的主客观关系,揭示了财政分配方式在不同生产条件下具有特殊的运行方式。改革开放后,财政分配作用有了变化,预算在社会分配中比重下降,客观上要求重新认识财政调控国民经济的直接形式和间接形式。然而一些人以为我国现在搞市场经济了,主张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消费论”、“公共产品论”改头换面地引入到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中来。许毅教授在《中国特色论》一书中,写了10篇文章,专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论”。他在《财政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基础》一文中,对研究财政理论提出四个必须,即:必须明确财政学的地位,必须研究国内外的政治经济问题,必须明确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的关系,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理论与西方财政理论的区别。在对上述问题分析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阐述了“国家分配论”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内容十分广泛,概括其主要观点为四论,即:主体论(财政分配的主体是国家)、制导论(分配的目的在于制导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结构论(通过制导论,使生产力结构、生产关系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等建立在先进的科学基础之上)、机制论(研究利益关系,确定最佳的利益分配格局)。文章在最后提出:“为了适应时代对财政理论与财政政策提出的要求,在当前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通过对国家分配论的进一步完善,使我国的社会主义财政学体系更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要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出发,在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学说和政治经济学说,创造性地发展财政学理论与国家宏观调控理论。要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发 展观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思考,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论,又反对不加分析地使用拿来主义的洋教条以及狭隘小生产思维的经验主义。我们进行财政学研究,就是希望要在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过程中,广大财政研究工作者能更好地掌握研究问题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领会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科学的国家学说,使我国的财政学真正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学的一部分,以更好地指导我国的财政工作。”^①在《建立广义财政学的倡议》一文中,许毅教授又写道:“建立广义财政学要从分配方式与生产方式、财政政策与经济运行、国家职能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出发,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财经工作的实践经验,借鉴各国经济学科的优秀成果,以生产力结构优化为核心,以要素分配与利益分配的协调为基点,完善与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财政理论体系,重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体系和分配方式。”^②

“国家分配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深化。许毅教授又写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学初探》、《从社会再生产角度出发,重塑财政学理论体系》、《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国家职能和财政职能,发展和完善“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论》、《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财政理论体系与实际工作规范》等文章,考察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出了更深层次的解答,使“国家分配论”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

许毅教授的研究工作除了财经历史、财政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外,对宏观经济的各个领域均有所调查与研究。他不顾年迈之躯,以惊人的毅力,长期奔波于祖国的大江南北,特别是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我与他在一起开会,研究与讨论的均是财政经济史问题。会上讨论的是历史,但是会议之余他又去考察当地的工矿企业和农村,召开小型的

① 许毅:《中国特色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页。

② 许毅:《中国特色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7页。